

“自媒体”的各种平台中变得越来越和大学生们的生活紧密相连，甚至是无孔不入，以一种“隐形”的方式潜存于他们的周遭。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要摆脱“工具理性”的思维方式，以“合目的性”去关照当代大学生的生存境遇，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其三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要注重培养大学生的“主体性”意识。表面上看“自媒体”时代多元文化的传播看似更有利于释放“主体性”，而实际上文化工业的大繁荣背后是“数字操控”的时代，我们重新变成了“洞穴中的人”（一个由机器操控的人），“主体性”不是复归而是走向了“消亡”。在《启蒙辩证法——哲学断片》一书中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人类精神的功能作出过经典评述，他们认为：“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于物化的否定。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，被用于消费，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。精神信息的泛滥，枯燥游戏的普及，在提高人的才智的同时，也使人变得更加愚蠢。”^[8]因此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要引导大学生回到一种人的“自然本真”状态，一种真正具有“主体性”的境遇，即重拾被技术“绑架”了的批判意识，在纷繁复杂的“自媒体”时代回归“主体性”。

（二）人文精神——道德意识的回归

“自媒体”时代的“虚无化”释放了人性中“恶”的种子，酿成了严重的“网络道德”问题，这是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范式重建中必须正视和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。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大学生道德意识的回归？其一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要塑造道德的“闸门”。自媒体的“虚无化”摧毁了传统时代的道德“闸门”，鱼龙混杂的各种思想（其中无疑包括违反道德底线的思想）在没有“过滤”的情况下出现在“自媒体”平台，对大学生的道德观造成了极大冲击。高校“文化育人”有必要而且必须塑造道德的“闸门”，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道德观。其二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要注重“善念”的培养。道德教育一直是“文化育人”的核心内容之一，其目的就在于“扬善抑恶”，这也构成了不同时代“文化育人”的共同主题。不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，还是自媒体时代，变化的是文化传播的形式，而不变的是道德育人的终极目的。康德认为道德教育才是教育核心和灵魂，“一个人可能身体训练极佳，心智教化亦好，然而如缺乏道德的陶冶，他仍是一个坏人”^[9]。其三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要注重对“恶念”的抑制。康德的教育思想无疑为开解当

下中国“网络道德”问题提供一种哲学解读，其实不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“虚无化”的网络世界，一个受过道德陶冶的人更能抑制“恶”念，发扬“善”念。从根本上讲，当下中国的“网络道德”危机事实上是教育危机的一种真实写照，因为即便是“虚无化”的人也是教育的产物。“人性”就像一颗种子，其内在潜在着孕育“善”、“恶”的胚胎，“文化育人”的功能就在于能培植“善”的萌芽，遏制“恶”的萌芽。因此，“人类必须接受教育，主要是道德教育，一方面约束自己的非人性成分，防止人性蜕化为动物性；另一方面发展人‘向善’的潜在倾向和能力，从而形成善良意志”^[10]。

（三）话语精神——权威意识的复苏

在“自媒体”时代“草根话语”面临着深刻的话语危机，重塑权威话语并以此整合各种杂多的意见，树立话语新风的标杆显得迫在眉睫。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权威意识的复苏？其一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要注重塑造大学生核心专业能力素养。大学生要以“深刻性”、“专业性”的“专家话语”去消解以“无深度性”、“非专业性”为特征的各种“草根化”的话语，积极引导“自媒体”言论的风向标。其二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要注重“权威意识”的灌输。在“自媒体”时代，缺失的并不是“流行话语”，而恰恰是受其影响正在消解的“权威话语”。“由于自媒体事实上的弱管理，自媒体的虚拟化程度比较‘老’的新媒体更甚。这往往使意见的内容和意见的主体分离。我们从自媒体上看到一条意见，意见的内容是实实在在的，但意见来自何方何人经常是搞不清楚的。”^[11]正是由于“意见”和“主体”相分离，滋生了“逃避监管”的心理，使许多发声者抛去了“严谨的态度”和“求证的过程”，肆无忌惮地发布所谓的“自由话语”。因此，塑造大学生的“权威意识”并以此整合各种意见，引导“自媒体”言论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。其三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要树立话语新风。草根话语打着“自由”的口号充斥在“自媒体”的各个角落，各种“草根话语”犹如一根根平行线，大家并行不悖，很少或者没有话语的“交集”，这样各种话语就变成了“语言孤岛”，没有任何影响力，这样的话从发声到结语就像一缕孤烟，留下的仅仅是话语残片或话语垃圾。因此，高校“文化育人”要注重以博学专业净化文化传播环境，以权威话语树立言论新风。